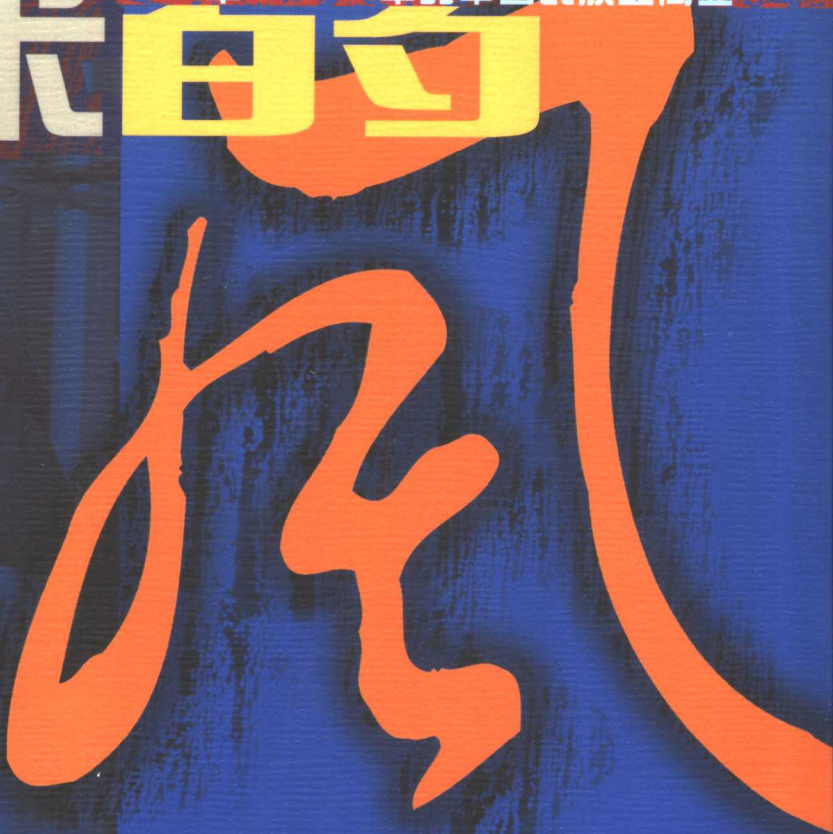


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

西 来 白 勺

谢善骁 著

1840年—1900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



读工商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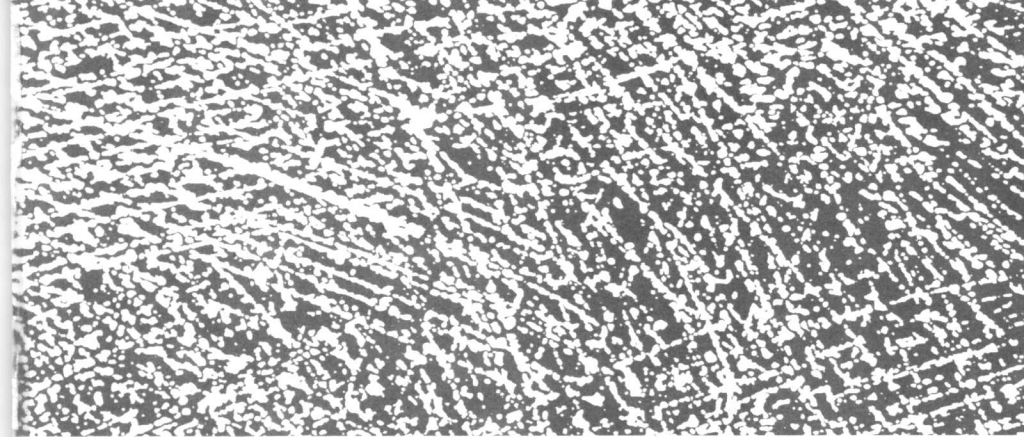
识精英品质

悟成功真谛

展现实业巨子历经的沧桑

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

北京出版社



1840年—1900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
谢善骁 著

西来的风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来的风/谢善骁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1

(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

ISBN 7-200-04862-3

I. 西… II. 谢… III. ①民族工业—工业史—中国—近代
②商业史—中国—近代 IV. 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7780 号

西来的风

XI LAI DE FENG

谢善骁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頤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9×1194 32 开本 8.25 印张 19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200-04862-3

F·278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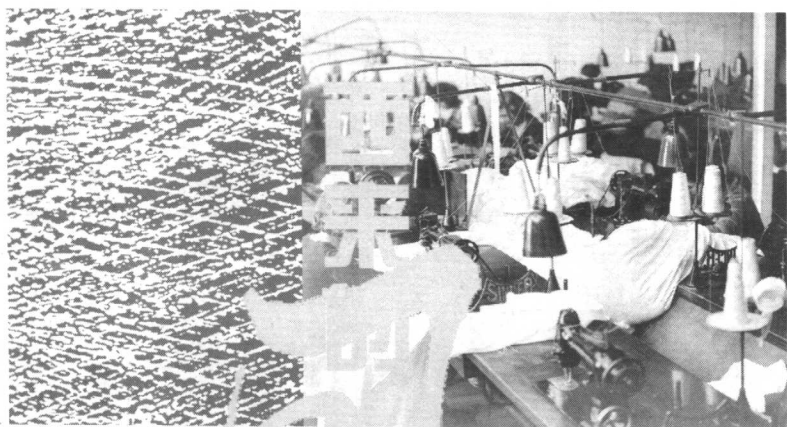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西风乍起，何日吹到大江东	(1)
千百年紡着疲惫的歌	(3)
回光返照中的“盛世”	(8)
龟兔赛跑，历史的裁决	(15)
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19)
第二章 迷梦中的夜郎，日暮途穷	(25)
中国，凝滞于中世纪的死海中	(27)
万马齐喑的乌枪时代	(31)
魂兮归来乎？近代的“夜郎”梦	(35)
饿狼敲门时的抉择，非虎即猫	(38)
道光的不幸和中国的悲剧	(42)
第三章 虎狼闯门，“天朝”焉敢说“不”	(47)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	(49)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54)
血荐轩辕，勇士的爱和恨	(57)
席卷于“锁国”日本的维新浪潮	(63)
第四章 西风烈，掀起一池波澜	(69)
第一声新雷滚过中国大地	(71)
号角声声呼唤近代文明	(75)
为思想解放而呐喊的勇士	(80)
平庸和愚昧——清室宣的遗传基因	(85)
第五章 兄弟阋墙，太平天国的悲与耻	(91)

	胜亦萧何，败亦萧何	(93)
	洪仁玕，洋务派的启蒙老师	(97)
	祸国殃民的权术女巫开始君临天下	(103)
	风云突变中的世界和美利坚	(108)
	 第六章 西风化雨，洋务运动卷起千堆雪	(113)
	在裂变中艰难出世的洋务派	(115)
	最初的较量和争斗，孰胜孰负	(120)
	云谲波诡的“船”案和“路”案	(124)
	第一代佼佼者走出国门之后	(130)
	 第七章 雨后春笋，民族工商业破土而出	(137)
	日益远逝的田园牧歌	(139)
	民族工商业在夹缝中成长	(142)
	“红顶商人”及其他	(144)
	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最早呼唤	(146)
	 第八章 “女神”挡路，西风难再度	(151)
	不堪回首的耻辱史	(153)
	慈禧有罪，罪该万死	(157)
	天涯何处是神州	(161)
	西风不度，恶风又起	(167)
	 第九章 反清救国，山雨欲来风满楼	(171)
	普天之下，莫非“洋”土	(173)
	大厦欲倾，危楼春晚	(176)
	改造民族魂的悲壮探索	(182)
	三民主义，横空出世	(188)

第十章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3)
革命运动在唇枪舌战中前进	(195)
江城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199)
孙中山，中国近代化的设计师	(202)
从欢呼到悲泣的 3 个月	(208)
第十一章 新乐和旧韵的不和谐合奏	(215)
干扰主旋律的高、低杂音	(217)
新文化套餐令人眼花缭乱	(219)
传统文化的余韵在南天昊地缭绕	(222)
没有跨越出近代历史门槛的才子	(226)
第十二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233)
又见春秋，又临战国	(235)
民族工业羽毛渐丰	(240)
“德”先生、“赛”先生向孔子宣战	(243)
中国文坛的青春之歌	(249)
终于迎来了马克思主义	(252)

第一章

西风乍起，何日吹到大江东



千百年纺着疲惫的歌

星移斗转，日陵月替，三千年的封建长河，终于潺湲地流过了古老的中国河床。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当封建主义步履蹒跚地走完自己毕生的里程后，留下了陈旧的历史和退色的辉煌，也留下了难愈的疮痍和不尽的悲歌。

报载，一群孜孜不倦的华夏学子，经过十余年苦苦研究和考证，获得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结果：业已查明，长期模糊不清和争论不休的中国夏商纪元，应该比已知的年表上提 1200 年。这样，三千年的封建长河又被上溯了千年之多。

诚然，这是世界文明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真应该感谢这些劳苦功高的专家、学者们，正是他们为伟大的中国又戴上了一个新的光环。然而，面对炫目的光环，敬仰长寿的巨龙，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沉重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想起了舒婷的一首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膀

——祖国啊！

我是贫穷，

我是悲哀。

我是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四千多年的封建长河，在把文明带到中华大地的同时，也把悲哀洒向人间。文明的光辉虽然也有灿烂的时日，但却显得短暂和苍白，而悲哀的沉淀则是连年不断，愈积愈厚。当日晷的指针走到 1840 年时，一场猝不及防的鸦片战争，终于摧毁了在贫穷和落后的重压下早已破旧不堪的华夏文明。西方近代文明的铁蹄在野蛮地践踏中国人民的同时，也把封建文明的画皮撕得粉碎，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革命。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王朝的倾倒，中国的近代化也真正得以启动，在母体中孕育了数百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最终艰难地以先天不足之体呱呱落地。

中国封建主义的起源，不仅早于西欧，而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还曾有过汉、唐、宋、明这样的亮点。18 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拥有难以想象的丰富文化遗产，当欧洲人还在野蛮的黑暗时代中昏睡时，中国已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了。如果说 16 世纪是西欧诸国进入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从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在此几百年之前，中国实际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

西来的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发展到了统一强盛的唐王朝时，经济已经达到高度的繁荣，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地主庄园、简单的商品经济和新型的市镇。大诗人杜甫在其诗篇《忆昔》中，颇为留恋地回忆和描述了大唐帝国全盛时期的社会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识。

盛唐时的都城长安，周长 30 余里，城中居民有四五十万之多，规模宏伟，商市繁盛，交通迅捷，食宿方便。长安又以其文明和富庶，年年吸引数以百计国家和地区的宾客，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使车水马龙的唐都变得异彩纷呈。

在官营和民营的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国内水陆交通及国际海道交通也随之发达起来，使得商业和外贸变得十分繁忙。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其名作《琵琶行》中，借助琵琶女的倾诉，从侧面反映了从事买卖活动的商贾们，在生意场上的活跃与奔忙：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到了两宋时期（960—1279 年），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因此大大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北宋都会汴京和南宋京城临安的城市规模及其繁华程度，是同时代世界各国都城所望尘莫及的。文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一书中，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牛，
你日夜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

对汴京热闹非凡的盛况作了详尽而生动的记载；画家张择端更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长卷名画《清明上河图》，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活龙活现地展示了汴京街景。南宋都城临安“衣冠毕会，

商贾云集”，而湖光山色的西湖胜景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魅力，怪不得 1275 年当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此地时，情不自禁地惊呼，他到了“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

宋朝的手工业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生产门类广泛，冶炼、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军火制造诸业，构成了宋代一系列重要的手工作坊行业。当时手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已经相当细致，产品十分精美，而且从业人员众多，在居于汴京的 20 万人口中，经营工商业和服务行业者竟达十分之一左右。在北宋时期完成的古代中国三大发明，即火药、罗盘（指南针）及活字印刷，更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起步和资本主义的发端奠定了基础。

西来的

千年之前的中国封建时代，当然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工商业诞生的必要条件，如果勉强说有，也仅仅是未成形的胚胎状态。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然而当历史翻到公元 1368 年以后的明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旨在商品交换的官营和民营手工业作坊，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城市商品经济也随之日益繁荣，并且先后形成了行业中心。于是，以江南经济发达区为主体，涌现出一批闻名遐迩的工业城镇，其中如丝都苏州、锦都松江、瓷都景德镇、染都芜湖等。更有一批工商业大都会，如苏、杭、扬、汉、广、渝等，都是十分耀眼的明星城市，而人口达百万的南京及 60 余万的北京则更是鹤立鸡群，俨然是超一流的世界大都会。

商品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工商业萌芽的信息，甚至从当时那些鄙夷商贾的文人作品中也能嗅到。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白话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中，选用了两篇故事：一是“施润泽滩阙遇友”；二是“徐老仆义愤成亲”。尽管讲的都是善善

恶恶、因果报应的故事，作者也无意在商品经济的题目上花费笔墨，但是主人公的经历及其所处的环境，却也使作者摆脱不了这原认为不屑一写的情节。两篇小说均以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工商业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为背景，前者的主人公从仅有一张织机的“夫络妇织”家庭作坊开始，经过“省吃俭用，昼夜营运”，终于“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成为拥有三四十张织机的工场。显然，施复夫妇实际上逐渐变成了雇佣工人、以剥削他人为生的民营业主，用现时的话说就是小资本家了。后者讲的是徐家的一个老奴阿寄，在主人家道中落之际，提出弃农经商的建议：“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倍！”他奔波行商于苏杭之间，通过对市场的调查分析，不失时机地补缺填空，买卖紧俏物资，终于帮助徐家发家致富。一个普通乡民尚且具有这种明显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当时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就可见一斑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朝的对外贸易，从而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奇迹和壮举。从1405—1433年的28年中，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历经位于南海、西域、西亚和东非的30多个国家。即使以最后一次远航归来的年代计，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也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早了59年，而比达·伽马以新航线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时间（1497年）早了64年！也就是说，在两位名传不朽的西欧航海家冒险远航半个多世纪前，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已经7次横渡大洋，远抵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口，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尽管封建王朝的积雪厚厚，冻土深深，尽管古代中国经历过几度分裂，历史也曾经几度倒退，然而新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仍是顽强而曲折地钻出于中国大地的地面，去争取自由生长的空间和阳光。这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历史过程，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的日益发

展，城市的规模愈来愈大及数量愈来愈多，促使和吸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加入于城市市民的队伍，而这支队伍的两极分化，就自然形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温床。手工工场的不断出现和逐渐扩大，专业分工的愈来愈细密和复杂，特别是在手工生产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更为中国近代化的提前到来准备了物质基础。

从唐、两宋到明代，经过几百年的孕育，几百年的蠕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脱胎而出的希望，漫漫的封建长夜，似乎即将透出新型生产关系的晨曦。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是千载一时的关键时刻，东方巨龙能否腾飞升空，就取决于这短暂的历史瞬间。

不幸的是，一股由奴隶制初期向封建制飞跃的清帝国军事铁流，从东北进关，攻陷北京，旋即又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征服了整个中国。

功败垂成，前功尽弃。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及其倒行逆施，在葬送了临产的明王朝同时，也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最终胎死腹中。从此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开始了一幕令人痛心疾首的惨烈悲剧。

回光返照中的“盛世”

西来的

近些年来，中国的影视界刮起了一股“清”风，虽说不大不小，却颇有影响力，中国的山岳河川一时“清”气氤氲，“清”波荡漾。风吹草低，牛羊尽现，由于清王朝 300 年间的王室内幕，宫闱秘闻，被形象而逼真地一一抖搂了出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着实让众多不知史实的民众百姓大饱眼福，不过也难免使一些人在捧腹大笑中走入“盛世”的误区。

“清”风成了现代人的娱乐圈，殊不知却是当年的一大禁区，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有意或无意地踏入过这一禁区，其结

果不仅使自己命丧黄泉，而且还使大批无辜的亲友受到株连。惨无人道的清军在横扫江南之际，留下了血洗扬州、杀尽江阴和三屠嘉定的罪恶记录。在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之后，为了窒息思想，巩固统治，又向知识分子举起屠刀，频频制造惊天地、骇鬼神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有 80 余起，特别是乾隆时期，肆意大兴的文字狱竟多达 70 余次！文人书生仅仅是因为一篇戏谈人生之文，几句赏花吟月之词，就在顷刻间死于非命，而且牵连亲故，满门抄斩，甚至还受到挖祖坟、锉祖尸的侮辱性惩罚。耳濡目染，前车可鉴，其时清朝的文人们莫不谈“清”色变，遇“风”噤声。

事过境迁，当年的皇帝在“清”风禁区内，不知冤杀了多少人，而如今“清”风不仅早非禁区，并且随着这股“清”风被影视的媒介送入千家万户，人们倒是听说了“康乾盛世”时期三位著名皇帝的许多勋业。一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不管是微服私访的康熙，还是惩奸养廉的雍正，或者文治武功的乾隆，似乎都成了中国古代帝王的楷模。

就事论事地说，清朝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和（前期的）乾隆，的确创造了那个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就是一些史家所言的“康乾盛世”。“盛世”的表现，一方面是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社会经济在相对安定的时期中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清王朝在这一时期不仅果断地镇压了国内的分裂割据势力，而且坚定地抗击了外部的侵略，从而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这种繁荣，甚至也反映在文化上，集古今图书之大全的《四库全书》，就是乾隆皇帝的杰作。而登临中国古典小说巅峰的文学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诞生在那个时期。

面对这一堵繁荣强盛的大墙，不少学者曾经赞叹不已，不少诗人先后为之高歌。然而，凡夫俗眼恐怕很难想象，巍然耸

立于大墙后面那一幅海市蜃楼般的画面，竟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千仞危楼。而且在这座欢声赞歌缭绕的危楼内，充斥着封建社会在走到穷途末路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黑暗和罪恶：专制的君主统治，残酷的思想专政，帝后的无度挥霍，吏治的极度败坏。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反映，则是土地兼并日甚一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强劲的小农经济和闭关锁国政策不断打击和扼杀着新生的民族工商业。

三代帝王用洗涤剂刷洗出来的繁荣，在维持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后，洗涤剂的效果不久即告失灵，却留下了一大堆泡沫堆砌的假象。这种假象自然能迷惑对内幕一无所知的平民百姓，包括多数的学者文人，而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表象所满足和陶醉的皇帝，也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洋洋得意。如果说前两位帝王康熙和雍正对潜在的危机还有所警觉，对自身的行为也有所收敛的话，那么当乾隆即位以后，特别在他的后期帝王生活中，就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松了绑。

西来的

乾隆是个少有的长寿皇帝，活了 89 岁，从 25 岁登上皇帝宝座，一屁股坐下，60 年没动窝，可谓洪福齐天。接过两代先王创造和积累的丰厚家底，乾隆皇帝在即位后的一段时期内，倒还算励精图治，把“盛世”局面推到了顶峰。然而，皇位坐得久，耳朵逐渐变聋，脑子也愈来愈糊涂了。这种“老皇帝”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似乎也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规律，乾隆皇帝自然难以幸免。乾隆中叶以后，清朝廷自上而下刮起了一股罕见的挥霍风、浮夸风、贪污风和腐败风，始作俑者正是号称“太平之君”的乾隆皇帝。从他的四次祝寿开始，接着是愈来愈不可收拾的五巡五台、五祭曲阜、七谒三陵、一登嵩山、一游正定，直到登峰造极的 6 次南巡，再加上年年避暑热河，岁岁穷兵黩武，朝廷府库的存银像流水般地向无底的深渊倾泻。

历代帝王中，豪奢荒淫者绝非偶见，而以隋炀帝下江南耗资最巨，留下的恶名也最甚。然而乾隆皇帝在祝寿和南巡中所

耗用的民脂民膏，较之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则是不输分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单是为庆其母孝圣宪皇后六十大寿而将其从西郊接回皇宫，竟然挖空心思，不惜代价，把十几里的必经之路布置成人间天堂，就不知道动用了多少库银，投入了多少人力。据载，当时一路上剪彩为花，垒锦作屋，色绢搭山，锡箔铺路，而且戏台成串，优伶毕集，载歌载舞，盛况空前。路边的人造景观中，一个寿星桃竟有几间屋子大；一座二三丈宽的翡翠亭，屋瓦全用孔雀尾羽铺成；一栋重檐三层的黄鹤楼，墙壁全是七八尺高的玻璃；而最离奇的出镜湖，以一个大圆镜为中心，四周镶砌数万块小镜子，一人映照，众星烘月，顿时现出无数身影。

乾隆皇帝效法乃祖康熙皇帝的6次南下，即常为后人津津乐道甚至描绘成诗情画意的“乾隆下江南”，其实乃是史无前例的大挥霍，大铺张，大荒唐，并且一次甚于一次，愈演愈烈。每次南下当然不是皇帝一人，也不仅仅是一群王室成员，而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队伍，随行的王公大臣、侍卫亲兵，人数往往多达千人以上，到第六次南下时，甚至到了2500余人之众。如此庞大的队伍，需要配备多少车船物品，需要修建多少路桥亭宫，需要准备多少酒肉瓜果，需要动员多少官员民众，答案也许是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更有甚者，沿途官员、地方豪绅和江南盐商，为了取悦于乾隆皇帝的“龙心”，不错过面圣从而获得褒奖和擢用的机遇（这当然是千载难逢的一步登天之良机），各显神通，争相献媚，使出了千奇百怪的

绝技和花招。

第一次南下的乾隆皇帝，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万岁”欢呼声中，兴高采烈地进入无锡城的，次日一早就兴致勃勃地慕